



曙光文學叢書

春砂賦

李光文 著



銀河出版社

春砂賦

李光文 著



銀河出版社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書名：春砂賦

著者：李光文

出版：銀河出版社

地址：香港銅鑼灣郵政 31130 號信箱

印刷：銀河出版社印務部

規格：850 × 1168 1/32

印張：5 字數：130 千

版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國際標準書號：ISBN 962-475-828-X

定價：28.60 元（港幣同價）



作者像

作者简介

李光文：男，汉族，馆员，广东兴宁市宁中区石岭村人。1948年秋在北平中国大学政经系读书，次年春参加华北大学学习，6月结业后转入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广东。原任南方大学二部18、21等班行政负责人、茂名县新垌区土改办事处副主任、阳春市文化馆主编，已离休。发表200多篇(首)作品。著有民间故事集《孔雀石》、诗词集《小草吟》、长篇小说《迷梦山城》(合作)、《刘三妹传奇》、《秋水伊人》、《铁流下江南》、《图穷》、《孽海缘上集阳谋》、《孽海缘下集血祭》、《编外女侦探》、《农奴戟》等14部作品。其中《图穷》、《阳谋》、《血祭》、《编外女侦探》和《蒋介石与陈洁如的风流怨债》，均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中国作家等单位主办的中华世纪论坛文艺评比一等奖。《周副主席让伞包》获中华世纪论坛三等奖。《临江仙·香港回归十年颂》被“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大庆全国诗词书画大赛”评为一等奖。现在系中国文艺协会理事，中国名家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乡土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民俗学会会员，广东民俗文化研究会会员，阳江市作协会员，阳春诗社社员和阳春市中华诗词楹联学会会员。

前 言

这可能是一本有争议的文集。

该集子收有作者十一篇文章：其中有三篇是描写有关阳春市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如《春砂赋》、《孔雀石之恋》、《明星，在漠阳江上空闪耀》。有五篇是写我家亲情的，如《慈祥的奶奶》、《爸爸醉卧坟头》、《母爱》、《湘兄之死》和《同享天年成一梦——亡妻 20 周年祭》。一篇是游记《与人妖共舞》，一篇是描写阳春秀丽山水的《碧水清溪话漠江》，一篇是反映阳春文化大革命的《文革 40 周年祭——阳春文化大革命纪实》。

所谓可能有争议的文集，就是指第一篇《文革 40 周年祭——阳春文化大革命纪实》报告文学而言。是否可以拿去出版？我经常犹豫不定。

1966 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危害之广，危害之深，旷古未有。为什么刚立国不到二十年的新中国会发生如此惨烈的浩劫？这是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要探讨的问题。

关于那一段历史，正如某评论家所说的情愿采取“集体遗忘方式”，好像根本不存在有那么一回事一样。这样好不好？唯物主义者的治学态度应该怎么样？

现在有许多身历其境的人逐渐离世了，而年轻人又没有身历其境，很感陌生，因此文革留给我们的各种历史记忆，快要湮灭消失了。我认为唯物主义历史学者、社会学者、思想文化史学者和文艺工作者的态度是应该尽快保留，尽快抢救，不然再过几十年，这一代人不在了，“文革”就在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了，这是对民族、历史极不负责的态度。

2008 年 12 月 18 日《南方周末》自由谈专栏，思想文化史学者何兆武先生写道：……历史档案应该公布，因为那是属于所有人

的，而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人的。即使当时不宜公布，事后也应该公布（各国一般规定 30 到 50 年后可解密，特殊档案可以到 50 年以上）……德国战败后出版《戈培尔日记》，戈培尔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出版他的日记不是为了宣传纳粹主义，而是为后世保存一份珍贵史料。

“文革”对于全国造成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我没有具体数字材料，而我所处的阳春县，因“文革”期间身历其境，结束后又调任市文化馆文艺主编，每次提起笔时，就不禁想起文革期间阳春大屠杀时血雨腥风的日子。鲜血染红漠阳江，漠江两岸居民不敢饮漠江水……为了保存这一珍贵史料，我乘机采访“文革”大动乱时期的有关身历其境的证人，并在图书馆、档案馆借阅并摘抄有关资料，经过艺术处理，汇集而成 7 万多字的报告文学。

但是这些的文章是不受官方欢迎的，轻则以“家丑不可外扬”斥之，重则可能以“影响安定团结”为名予以禁止。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因为这和毛主席“要相信人民”的教导相违背。应该相信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

古人云：胜己者强。一个敢于正视错误并勇于改正的民族，才是伟大的前途光明的民族。由中国共产党上层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又由它本身自觉地纠正过来，就是伟大、英明的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明证。

德国战败后敢于出版《戈培尔日记》，为什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我们伟大祖国怕这怕那？

历史是面镜子，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目 录

文革 40 周年祭——阳春文化大革命纪实·····	1
一、引子·····	1
二、阳春劳动大学学生大暴动·····	4
三、阳春劳大学生徒步北上串连·····	14
四、阳春青年群体大裂变·····	20
五、丧失理智的大屠杀前奏·····	26
六、揭开所谓抢枪事件的神秘面纱·····	29
七、春湾武斗事件始末·····	33
八、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41
九、合水公社人民武装部长大火拚·····	56
十、姗姗来迟的清理善后工作·····	60
十一、死里逃生的人·····	62
十二、工纠集中营里趣事多·····	76
十三、采访录·····	78
十四、结论·····	84
碧水清溪话漠江·····	88
春砂赋·····	89
明星,在漠阳江上空闪耀·····	94
孔雀石之恋·····	102
慈祥的奶奶·····	108
爸爸醉卧坟头·····	114
母 爱·····	118
湘文兄之死·····	124
同享天年成一梦——亡妻 20 周年祭·····	130
吃喝玩乐泰国游——与人妖共舞·····	140
后 记·····	149

文革 40 周年祭

——阳春文化大革命纪实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引子

我生长在广东省兴宁市宁江河畔，但我自 1953 年茂名土改结束后调到阳春工作以来，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我完全可以骄傲地说：阳春是我的第二故乡。

阳春位于粤西山区，四周崇山峻岭，漠阳江由东北而西南贯穿全市。两岸有百多公里长的喀列斯特地貌，怪石嶙峋，漠江如带，风光绮丽，景色迷人，真是“高峡明湖开玉镜，群峰倩影入丹青”。难怪南宋枢密院编修胡铨对素有“小桂林”之称的阳春，曾有“路入阳春境，杳然非世间”之叹。

阳春是国家地质公园，广东省的旅游胜地。可是现在的年青人，也许从未想到在二、三十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美丽、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浩劫。在那魑魅疯狂的黑暗日子里，那些自认为最忠于毛泽东的“红卫兵”、“农纠”和“工纠”等刽子手们，怀着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十分

残忍的手段，不分昼夜地大量地成批成批地杀人。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已经达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据说有名有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2665 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 56 万人的 4.8% 弱，比信宜、电白、新兴和阳江等邻县几乎多一倍，在广东高居首位，在全国仅次于湖南道县而居亚军。

阳春县劳动大学是一所半农半读的新型大学。1966 年秋，我奉文教科之命，再次来到 1957 年我被错划为极右分子时下放监督劳动的黎湖农场、现在名为劳动大学继续改造。我是背着简单行李，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从松柏青山农场来劳大报到的。

专门负责我改造工作的副校长区西（他是我的老相识。当时我在文教科工作时，他是永宁公社文教助理），见我身体单薄，又高度近视，便对我说：“你到看牛班看牛吧，还有一个 14 岁小谭帮手。小谭的妈妈梁明慧也是未脱帽的右派，她负责养猪；住在仓库地坪南侧、水渠北面的木皮房。那木皮房共有三卡，西卡是职工饭堂，中卡梁明慧住。你和老革命陈全共住东卡，东卡一分为二，陈全住临水渠的南边，你住北边。我跟陈伯说好了，你下仓库找他，他会具体指点你工作的。”

我背着卡包，在一个同学带领下来到仓库找到陈伯。他是个 60 开外的老革命，身体瘦小，背微驼。他安排好我住处后说：“牛棚就在对面公路上边山坡上，共有大小水牛 6 头，黄牛 2 头。在校部饭堂吃饭。明天上班还是下午？”

“下午就干吧！”

午饭后我到梁明慧家里坐。三反整风运动时，她丈夫谭煊材划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现在双滘公社税所帮助收税。原来她和他都在县农建科工作，我在文教科，时常见面。我和小谭到牛舍看看牛群。当场决定我看两头水牛：一头是名叫“崩鼻牛”的母牛，一头是她生下的水牯。他看大水牯和几头牛仔。其余的几头由学生们轮流派出二三人帮手。

下午上班时，因农闲没职工驶牛，有几个学生便和我这个监督

劳动的右派一齐上山看牛。他们听说我是因发表一出针砭时弊的独幕喜剧《通报表扬》而划为右派的，心里都十分奇异地关注我和暗暗尊敬我。但最初他们还有些顾虑，不愿和我说话。后来觉得我为人随和，心地善良，也便渐渐地、毫不忌讳地和我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因而我认识了不少劳大学生，这就为我今后写这篇报告文学提供许多方便。

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也听到一些有关司派与旗派派斗和以后全县范围内大屠杀的简单情况，但那是十分零乱的没有系统的第二手资料。1978年秋我平反后调任阳春县文化馆文艺主编，看了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文件和报刊上的有关报导，我才比较系统地了解全国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1990年秋，我当选为阳春县第三届政协委员，和春城镇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会议讨论期间有人提到阳春大屠杀惨状时，代表们都希望我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以警示后人。我知道这担子重，也觉得义不容辞，但我一想起反右时因一出喜剧就让我扣上极右帽子蹲牛棚18年，又感到心有余悸。可是一个正直的文艺工作者的良心，又时刻提醒我：一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是不是富有干预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中国文艺协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我又觉得我应义无反顾地继承党的文艺优良传统，于是我以阳春文化馆文艺主编身分，到各公社大屠杀重灾区调查了解，获得更多更感性的素材，为创作品位较高、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学作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首先到县志办见到我老朋友钟奇渭同志。他个子不高，比较肥胖，圆圆的脸上常带笑容。他以前在松柏区府工作，我到松柏搞运动时，常与他接触，彼此比较熟悉。他对我所提的问题，尽可能予以回答。我首先问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阳春到底死了多少人？”

“阳春在文化大革命乱打乱杀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665人，但许多人认为至少在3000人以上。”他马上毫不含糊地回答说。

“噢，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因为有许多杀绝户无人理；还有刚出生不久未安名的婴儿未计在内。”

“啊，这可是生命呀！可怜无辜的生灵！”我内心悲痛地呼叫着。

“到下面去看看，你就会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有更感性的认识。”

我揣着一颗沉重的心离开县志办，回到家里，我那颗热血沸腾的心久久没法平静。我想这题材有历史研究价值，值得写，但这题材不为人们、尤其是不喜欢家丑外扬的当官者所喜欢。怎么办？写不写？我考虑了几天，我重温党的文艺要“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优良传统教导，于是我终于走上负笈采访当年大屠杀重灾区调查了解的艰苦历程。

二、阳春劳动大学学生大暴动

阳春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是在全国文化大革命大气候下而发生发展的。

1966年5月29日晚修后，北京清华附中六五届高二班学生卜大华、张承志等八位学生，到附近圆明园废圩上的一个亭子间开会。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命名为“红卫兵”。他们的意图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他们庄严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洒尽最后一滴血。”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准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红卫兵”小将们便在清华附中贴出“红卫兵”大字报。这是最早公布的“红卫兵”组织。

我记得那天下午收工回来，正在他门前小厨房煲饭吃的陈伯就对我说：“光文，今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广播，你

和梁明慧一齐去听。”

“哪里听？”我开脱房门。

“大礼堂外面。”

“外面？”我反问。说心里话，我有点吃惊和反感：在外面听得见吗？更重要的是他把我俩不当人看，真是岂有此理。

“是的。在礼堂外秋果树下。”陈伯扳起脸孔，“准时去！”

管我们牛鬼的陈伯命令已下，我只得俯首听命了。

我从饭堂吃饭回来，便在水渠堤北面营造小厨房。我拿今天上山看牛时拾来的竹木竖四个柱，然后挂横梁，再做金字架。在开会前，终于搭好厨房架子，明天再拾些废杉木皮就可以说我真正拥有自己的小灶了。

天漆黑一团，我和梁明慧准时到礼堂外秋果树下时，大礼堂灯光如昼，人头涌动，广播器已沙沙作响了。

“学生们，职工们，静静，广播现在开始！”这声音太熟悉了。那是区西副校长浑雄的男中音，过去文教机关系统干部成立一个文教战线合唱团，我是合唱团员，他是合唱团的首席演唱主力。

他话音刚落，广播器便传来女播音员激昂、愤懑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

由于广播器正对礼堂后面听众，外面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她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大字报不长，只10分钟便讲完了。我和明慧马上离开秋果树下默默回家，步履有些慌乱。明慧忧心忡忡地问我：

“光文，你看是不是又要搞什么运动了？”

“可能。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吗？”

“运动一来，我俩脱帽的事又要拖下去了。”

“是呀！”我心情很是沉重。

“姚文元的《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你看过吗？”

“看过。它指控《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笑死人了。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底到1960年11月，怎能“影射”1961年的现状？他有预见吗？这不是学术争鸣，尽扣政治帽子。”

梁明慧点头：“吴晗的《海瑞罢官》呢？”

“当然看过。那可是遵命文学呀。”

“遵命？遵谁之命？”

“还有谁，毛泽东呗！”

“哦？怎么回事？”

“1959年初，毛主席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一次看戏曲《生死牌》时，对身边的乔冠华同志谈到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建议你找一位研究历史的人写这方面的文章。乔冠华同志便找到了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

“原来这样。”

快到家了，我不想再多说话，匆匆回房点燃小火水灯，呆坐在床上，一会，才拿过堆在方桌后头的日记，执着钢笔写起日期：1966年6月1日。后面怎么写呢？对于中央广播的事，我是一头雾水不知天的。我迟疑了，不知该写什么好？想了好久也不得要领，便只写下“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古诗来。

是夜，我辗转反侧，难于入眠：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到广州我弟弟家看到《中国左祸》一书，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据文聿的《中国左祸》介绍：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首先在高校点燃。前几年的“学术批判”已经火药味很重，各种矛盾迅速激化。中央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必须从基层开始。于是中央抓政治运动的康生，便派其夫人曹轶欧亲临北京大学，鼓励学生“造反”。从学校领导到中央，都要造反。

5月17日，在离北大南边4里远的西颐宾馆，曹轶欧召见了北大哲学系原总支副书记聂元梓，听取她汇报北大情况后说：“《五

一六通知》是总纲，你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可以写大字报。”

聂元梓心领神会，立即回校布置。于是5月25日下午2时，北京大学大饭厅（也就是前几年批斗老校长马寅初所在地）出现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声称“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大字报一出，北京大学一片混乱。不明真相的干部、知识分子，有的还贴了反驳的大字报，指责聂元梓等人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

康生把大字报底稿背着周总理、政治局，直接转给在杭州的毛泽东，于是5月31日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上便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也就在同一天，毛泽东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

对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国内外新闻界和国外情报部门是无时无刻不关注他一言一行的。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他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对中国甚至全世界产生影响，所以他们敬业地时刻跟踪他，希望得到他的一些资讯，那怕写一篇几十字的简单报导，刊上他的照片，重时效的新闻价值就高了。但是，从1966年6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在哪里？却成了时刻追踪他动向的国内外新闻界和国外情报部门的难解之谜。

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说他“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国内外新闻界和外国情报部门又拼命猜测“西方山洞”又在哪里？原来它就是在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的滴水洞。这是196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奉命主持兴建的。于是我于1993年5月初到株州我堂弟李新文家里，第二天便和他一齐乘火车到韶山站。下车后先到毛家湾参观

毛泽东故居、毛泽东纪念堂和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园时所住松山宾馆。在毛泽东广场毛泽东塑像前拍照后，便又沿着小公路到滴水洞参观。

公路在大山中间的田垌里伸延着，两边绿油油的水稻，长势喜人。沿途进进出出的人很不少，间有小轿车出入，多为游客。越往前走，山谷愈窄，最后公路左侧，便是个不很大的停车场。

右侧山脚公路上，有一座用水泥塑造的“滴水洞天”大门楼。进入后可见右侧突兀的石壁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滴水洞”三个大字，金光闪闪，浑雄有力。紧接着便是千米石壁碑廊。上刻有胡绳等党政领导的诗词，令人目不暇接。走到谷底，便是建在右侧石山下的滴水洞一、二、三号楼群。一号楼实际是平房，背靠虎歇坪，前朝龙头山，古朴清幽。1966年6月，毛泽东就住在这里。原来滴水洞不是天然岩洞，仅是一条狭谷而已。山涧有流泉潺潺而下，因落差大而形成若干小池子，土名吊水洞，原为毛泽东祖父墓地。现改名为滴水洞。我们走进一号楼会客室，向导便热情地告诉我们说：“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回到家乡时，住在韶山的松山宾馆。由于宾馆前车水马龙，后面的韶山小学也很嘈杂，毛泽东很希望有一套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宁静空间，以便更好地处理国家大事。于是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后休息时，抽着雪茄，指着山下滴水洞对陪游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那里给我搭个茅棚好吗？’”

小舟向省委汇报后又向中南局陶铸书记汇报，一致同意给毛主席盖间房子。是年秋，周小舟被打成彭德怀集团撤了职，盖房问题由继任的省委书记张平化具体落实，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指挥代号为“二〇三”工程，属绝对保密。1962年建成。里面有防震层、防空洞，一切都是现代化，空中很难发现，即使扔下原子弹、氢弹也不碍事。

我听后不禁想起秦始皇在骊山筑阿皇宫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她带我一步一步往前走，说：“这里为宽阔的会议厅，隔壁为约20平方的毛泽东卧室，前后有大木窗紧靠回廊，前窗下有一黄色漆木书桌。后窗下有张大木床，侧有两个书柜。不过现在已是人去楼空了。”

“当时党内外斗争很激烈，为什么他要跑到这山旮旯来？”我不解地问。

“那时毛泽东的心情不好，国内经济不景气，阶级斗争激烈，加上他已76岁高龄，身体日益孱弱，心境每况愈下，但他还是手持放大镜审阅从北京空运来的重要文件，并写下文化大革命16条中最关键的一条：一斗二批三改；同时打好‘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腹稿。”

“噢，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经毛泽东同意派驻的），许多院校便形成了“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混乱局面。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她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运动。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北京日报》边隙上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指出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爆炸性的问题？当时我是懵懵然不知所以然的。待我平反后调任文化馆文艺主编，查阅了大量历史文件后，才得知其中奥妙。

这得从全国经济形势谈起。到了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想破灭后，刘少奇在广大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毛泽东渐渐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冲击。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地位上升，有如